

# 大运河诗词：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形态

盘随云

**摘要：**大运河诗词是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也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诗词大多创作于唐宋时期，主要描写作者在大运河上或运河之畔的所见、所感，表现其对大运河的所思、所想。大运河诗词不仅像一把历史之“镜”，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大运河的存在状态与发展变迁、人们对大运河的情感寄托和价值判断，而且也具有一种精神之“力”，通过影响乃至改变人们对大运河的看法与评价，推动大运河的保护、利用和开发。

**关键词：**中国大运河；大运河诗词；非物质文化形态

**作者简介：**盘随云，男，特聘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附中、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310030）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5) 02-0112-06

作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曾经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宋时期，大运河一直都是连接位于江南的经济中心与位于北方的政治中心的交通大动脉，其沟通了多个水系，最终促使了中国水路交通网的形成，运河也因此成为了一条经济大动脉。而后，随着运河经济、生态的发展，在其沿岸也逐步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包括内、外两个层面：外层为物质文化，即运河本身及其衍生物作为客观的物质存在；内层则是既基于物质文化又是其内在支撑的非物质文化。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除了产生于运河沿岸的独特手工艺、食品制作技术等，还有就是与大运河相关的古诗词，即“大运河诗词”，也主要创作于唐、宋时代。

中国古诗词在唐、宋最为丰盛，这与当时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有某种联系吗？笔者认为，两者不仅有联系，而且还曾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由此，才有那些独特的诗词佳句流传至今，也才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作为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从上述思考出发，本文拟以中国大运河诗词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对大运河的直接或间接描写，分析其中所表现的古代文人对大运河的感受、认知和评价，阐述大运河诗词与大运河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论证大运河诗词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形态在整个大运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一、“源”与“镜”：大运河与大运河诗词

如前所述，唐宋时期大运河作为连接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交通大动脉，推动了两朝经济与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恰恰是在唐宋时期，中国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大批的文人墨客创作了无数计数的文学作品，而诗与词则是两朝文学的代表。当时流传下来的大量诗词作品中，有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描写运河的，抑或是文人创作于运河沿岸或运河之上的，这便是笔者所界定、在本文中讨论的“大运河诗词”。

由于一些诗词所描写的场景是否属于大运河，或其情思是否发自大运河、意境是否源于大运河，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因此“大运河诗词”的确切篇数还难以统计，但从目前已经确定的作品来看，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对诗人/词人途径大运河时所见之景和所生之情的描写与抒发；另一类则是对大运河开凿功过的评价以及相关思想的表达。

运河水系是唐、宋人出行的重要交通，因为乘船不仅比坐车舒适而且运河水系四通八达东南西北均可到达。著名诗人王安石曾在运河船上写下了经典名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当时王安石是在退居南京（古江宁）时被宋神宗重新启用，将要赶往开封（古汴京）赴任，然而开封位于南京西北，诗中的瓜州（即扬州）位于南京东北，王安石经扬州至开封岂非南辕北辙？他本可由陆路直接去往开封，又何苦定要经瓜州绕道而往目的地？原因即如上述。由此说明，坐船从运河出行在当时不仅常见，而且为人们尤其是诗人们所喜爱，哪怕为此绕道而多花时日也心甘情愿——按理说王安石适逢东山再起之际，其到任之迫切心情可想而知，却仍然如此——不过若非如此，又怎会有脍炙人口的《泊船瓜洲》问世呢？<sup>[1]</sup>

大运河既然是一条为时人、诗人所喜爱的交通河流，它就必定承载了无数装满了乡愁与客愁的船只。开封人崔颢，离家漫游二十载，回乡之时兴奋无比，与家乡距离越近，其心情越愉快，相由心生，其所见之景亦变得美丽、令人惬意，淮河之水终于仿佛走到了尽头，运河上的波涛也不再给人以压抑或恐惧，于是借景抒情，写下《晚入汴水》：“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溯河。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风波。”<sup>[2]</sup>这便是乡愁和烦恼的结束，温馨与幸福的开始。然而还有许多运河诗词，描写的不是愁的尽头，而是愁的开始与愁的高潮。“独立长堤上，西风满客衣。日临秋草广，山接远天微。岸叶随波尽，沙云与鸟飞。秦人宁有素，去意自知归。”<sup>[2](1532)</sup>这是许棠游玩运河时《汴下暮秋》的愁；被贬的欧阳修在运河上更是以一首《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河闻雁》寄托内心愁绪：“阳城淀里新来雁，趁伴南飞逐越船。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sup>[3]</sup>

乡愁与客愁的气息在大运河上弥漫，与此同时，离别之愁绪也布满了运河沿岸。最著名的要数宋代婉约派大词人柳永的那首《雨霖铃（寒蝉凄切）》了。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这首创作于运河旁的词都到达了极高的境界。都门外的汴水（大运河）畔，正是这首词所描写的送别的场合。不同于许多送别诗词，这首《雨霖铃》描写的是极悲的气氛，没有欢声，没有寄托，忘却感激，忘却勉励，留下的只有惆怅与愁绪，引发了一句经典感慨：“多情自古伤离别”，这是无奈，也是悲哀。托物言情，广用白描，把一切感情融于百余个字，又将百余个字化作一“伤”，通过“伤”表现了不舍、留恋，“没有了知己，良辰好景皆为虚设，千种风情也都无处倾诉”，作于运河旁的这首词因其内容、结构、表现手法之绝妙成为了千古绝唱、传诵至今。张先，一位与柳永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大词人，对运河（汴水）也是情有独钟。如他用女子口吻写情的《江南柳》“隋堤柳，波急路尘轻”，<sup>[4]</sup>写追忆送别的《惜琼花》“汴河流，如带窄。任身轻似叶，何计归得”。<sup>[4](115)</sup>其后，豪放派词人苏轼，喜爱用词送别寄远，其中也有多首是以运河（汴河）为背景的。如《江城子》“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sup>[4](398)</sup>北宋后期，出现了另外一个擅长写羁旅漂泊的大家周邦彦。他写旅途怀人的《氏州第一》“官柳萧疏，甚尚挂、微微参照”，<sup>[4](717)</sup>写重游旧地的《夜飞鹊》“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sup>[4](751)</sup>以及《兰陵王》“柳荫直，烟里丝丝弄碧”<sup>[4](738)</sup>和《尉迟杯》“隋堤路。渐日晚、密霭生深树”，<sup>[4](744)</sup>都把送别的地点放在了隋堤之上、运河（汴河）之畔。

其实，许多古诗词所描写的景物与事件皆发生在运河之上，但由于诗人没有点明具体地点，其作为“大运河诗词”并不为人们所知晓，这正是大运河诗词究竟有多少而难以准确统计的根本原因。

隋炀帝主持修建大运河，其功与过一直饱受争议。隋朝既是一个繁盛的朝代，同时又是一个短命的朝代，开凿大运河对其必然有正面与负面的影响。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墨客对其进行评价。有的认为大运河是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也有的认为大运河是隋以后朝代兴盛的有力保障。

白居易对于“开河”是彻底否认的，他的古体诗《隋堤柳》着重描写了开凿运河的种种不利影响，在他看来，大运河无非是隋炀帝为自己消遣而开凿的，劳民伤财，最后导致了隋炀帝丧身亡国的结局。“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

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酈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sup>[2](1049)</sup> 自白居易起，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到了“评运河”的文学阵营中。当然，也有人怀古而不评价，如杜牧的《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游人闲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sup>[2](1327)</sup> 有人则将怀古与批判相结合，如胡曾的《汴水》：“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过，惆怅龙舟更不回。”<sup>[2](1655)</sup> 此时期的多数诗篇都不约而同地明确指出隋炀帝开凿运河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逐渐地，随着大运河给人们带来的利益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诗人、词人开始对大运河开凿进行辩证的评价。皮日休在《汴河铭》中指出，运河对于隋朝或许是过错，但对于唐朝却是利与功：“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不劳一夫之荷畚，一卒之凿险，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sup>[5]</sup> 他后来更是在《汴河怀古（二）》中大力赞扬了隋炀帝，认为其修建大运河的功不亚于治水的大禹：“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sup>[2](1558)</sup> 无独有偶，许棠在《汴河十二韵》中也提出，隋炀帝修建大运河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娱乐，更是为了“兼通楚塞”与“千里便”的目的：“昔年开汴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直断平芜色，横分积石流。所思千里便，岂计万方忧。首甚资功济，终难弭宴游。空怀龙舸下，不见锦帆收。浪倒长汀柳，风欹远岸楼。奔逾怀许竭，澄彻泗滨休。路要多行客，鱼稀少钓舟。日开天际晚，雁合碛西秋。一派注沧海，几人生白头。常期身事毕，于此泳东浮。”<sup>[2](1632)</sup> 然而到了五代与北宋，评价运河的诗词落入了俗套，缺乏创新，其价值与意义不及初唐的批判与晚唐的辩证。

实际上，大运河对于宋代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使全国各地经济与政治的协调更加有效。运河逐渐成为了一条重要的粮食运输通道，因此运河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同时，北宋政府也加大了对运河的管理、改造力度，因为运河与黄河相通，泥沙常常会聚在河底导致运河堵塞。所以，这段时期虽然没有特别出彩的评价运河的怀古诗篇，却出现了许多新颖的表现运河现实的诗词，对治理运河提出自己的见解。石介认为运河之运输粮食的功能使得北宋时期在朝廷内掀起一阵奢靡之风，因此主张停罢漕运，朝廷内实行节俭政策，各州不应再向朝廷供粮，而应“一州食一州”，为此写下《汴渠》：“隋帝荒宴游，厚地剝为沟。万舸东南行，四海困横流。义旗举晋阳，锦帆入扬州。扬州竟不返，京邑为墟丘。吁哉汴渠水！至今病不瘳。世言汴水利，我为汴水忧。利害我岂知，吾试言其由。汴水濬且长，汴水湍且遒。千里泻地气，万世劳人谋。舳舻相属进，馈运曾无休。一人奉口腹，百姓竭膏油。民力输公家，斗粟不敢收。州侯共王都，尺租不敢留。太仓粟峨峨，冗兵食无羞。上林钱朽贯，乐官求要优。吾欲塞汴水，吾欲坏官舟。请君简赐予，请君节财求。王畿方千里，邦国用足周。尽省转运使，重封富民侯。天下无移粟，一州食一州。”<sup>[6]</sup> 而梅尧臣的《汴渠》则主张不能停罢漕运，而朝廷应节约省俭、杜绝浪费，由此才能令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实山野人，不识经济宜。闻歌汴渠劳，漫缀汴渠诗。汴水源本清，随分黄河枝。浊流方已盛，清派不可推。天王居大梁，龙举云必随。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肩牛骡驴，定应无完皮。苟欲东南苏，要省聚敛为。兵卫诟能削，乃须雄京师。今来虽太平，尽罢未是时。愿循祖宗规，勿益群息之。譬竭两川赋，岂由此水施？纵有三峡下，率皆粗冗资。慎莫尤汴渠，非渠取膏脂。”<sup>[7]</sup>

由上可见，隋朝灭亡之后的初唐时期诗人们对于运河的评价是弊大于利；晚唐时期人们开始感受到大运河给自己带来的益处之大，因此对其评价为功大于过；宋朝开始，运河与政治、经济的联系越



发紧密，其导致的问题也开始展露于眼前，于是文人们开始对改造运河提出建议。

总之，不论是对途经大运河时所见之景和所生之情的描写与抒发，还是对大运河开凿功过的评价以及相关思想的表达，大运河诗词创作始终都是围绕运河与运河沿岸的生活、政治、经济等而展开的。由此可见，作为非物质文化的大运河诗词如同一把多面的“镜”，对大运河这一物质文化进行了多角度的反映。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正是独一无二的大运河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大运河诗词”——物质文化归根结底是作为一种独特“镜像”的非物质文化的“源”。

## 二、“动”与“力”：大运河的发展与运河诗词的推动

前文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阐述了作为物质文化的大运河对其非物质文化形态——大运河诗词的影响和作用：大运河诗词的内容、形式乃至其存在本身和发展趋势都离不开大运河的开凿、功能的逐渐完善及其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但是，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影响通常都是相互的，大运河能作用于大运河诗词，那么大运河诗词能不能反作用于大运河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运河，会不会多多少少受到了大运河诗词这一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影响呢？如果有某种影响，那么其原因何在、表现何在、意义何在？

正如长城被称作凝固的历史，中国大运河也被视为“流动的历史”，其形成的“大运河文化”也可叫作“流动的文化”。“大运河文化”不同于一般的“运河文化”，一是在于其多了一个“大”字，此“大”之意义显示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第一，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长的一条人造运河（全长1782千米），其沟通的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跨越的省市（四省二市）也极多；第二，“大运河文化”起源早（从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起）、跨越时期多（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其历史囊括了中国社会的主要发展史。二是在于“大运河文化”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独一无二，无可模仿，没有雷同：无论是其沿岸各地的食品制作和刀、剪、剑、伞、扇等手工艺，还是大运河流经地的诗词、文章以及琴、棋、书、画、雕刻、印石，都是中国独有的特色文化。“大运河文化”既可以作为大运河开凿以来长期创造形成的必然产物——一种社会现象，也可以作为大运河流域及其沿岸社会历史的沉积物——一种历史现象；既囊括了政治、经济等国家因素，又包含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社会因素。由此，“大运河文化”便同时具有三种形态：大众文化，涉及生活习俗、衣食住行；高级文化，表现为建筑设计、文学创作、艺术/工艺创造；深层文化，如民族精神、价值取向等。显然，大运河诗词作为文学创作其本身属于其中的高级文化，但其具体内容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又在大众文化之列，而其表达、体现的则往往是作为深层文化的思想、精神和价值观。

以唐代诗人孟云卿的《汴河阻风》为例：“清晨自梁宋，挂席之楚荆。出浦风渐恶，傍滩舟欲横。大河喷东注，群动皆宵冥。白雾鱼龙气，黑云牛马形。苍茫迷所适，危安惧暂宁。信此天地内，孰为身命轻。丈夫苟未达，所向须存诚。前路舍舟去，东南仍晓晴。”<sup>[2](367)</sup> 诗人在这里借汴河（大运河）之景写自己人生之失意——先是风越刮越急，接着白雾缭绕，而黑云布满毫无生机的天空，象征自己处于人生低谷，经历了失败，前途也迷茫。可诗人却并没有因此而沮丧，反之，他将“白雾”当作“鱼龙气”、把“黑云”看成“牛马形”——即使人生再朦胧，只要心有坚定的信念，白雾也可以化作鱼龙；即使社会再黑暗，只要心向光明，黑云也会成为生机勃勃的奔驰的牛马。紧接着，诗人抒发内心的情感：失败与迷惘只是暂时的，人生与大自然一样，阴晴圆缺都是必然的，何况自己的志向还没有达成，不能轻易放弃，而要矢志不渝地坚持拼搏，因为黑暗总会过去，光明就在前方；而前方的河与路，诗人甚至可以舍弃舟船、车马而只身去闯荡，因为身命与志向和信念相比，是多么的卑微。诗人描写运河上所见之景象，通过诗的形式反映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体现并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与追求。

当然,大运河诗词中所直接体现的人生观或世界观并非都是如《汴河阻风》这般积极、正面的,也有不少诗人在大运河上对人生表达了悲观、消极的态度,而从这种看似负面的态度中,读者又能感受到诗人对后人的劝慰与告诫,这样一来,这貌似悲观的诗词又变成豁达的作品了。杜牧的《汴河阻冻》这样写道:“千里长河初冻时,玉珂瑶佩响参差。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sup>[2](1327)</sup>诗人用运河冰底的水比喻浮生,写冰底水匆匆流过却不被感知,比喻人生美好时光总是悄然逝去,来无影去无踪,人还来不及察觉它便离去。可人真的没有感知到青春的流逝么?或者说,人真的没有察觉日夜东流的冰底水么?人必然会察觉到的,不然怎么会有“玉珂瑶佩响参差”一句呢?可惜就算人对时光与青春的逝去有所察觉,这一自然事实永远也无法改变,这又是多么可悲?以乐景衬托哀情,诗人的无奈之情体现在这看似欢乐的景象中。杜牧以诗表达人生观:人生不就像冰底下的水那样么?人生一天天地过去,可回头看却仿似什么都没发生、未成大事,而时间却悄悄流走了,什么也没留下。诗人勉励读者活在当下,珍惜青春与人生,不要让时间白白流逝,更不要让人生充满遗憾。

许多大运河诗词都是这样,在描写大运河、寄情大运河的同时传达了对人生的思考与理解、对事物的认识与评价、对社会的感慨与批判,因此它们在被人传诵的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所以大运河诗词具备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其蕴含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不仅会影响普通读者,也必然会关注大运河、甚至决定大运河“命运”的人,并通过这些人而影响大运河的存在状态。如前所述,对于大运河的评判文人们的观点在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大运河的功能与形态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人墨客在写诗填词的时候受到了社会上的某种思潮的影响,而这种思潮又极有可能起源于其他诗人、词人们的诗词创作。众所周知,晚唐的皮日休是最早赞扬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诗人之一,从现存的诗集来看,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诗人赞同隋炀帝这一工程。皮日休发现了隋炀帝大运河工程的功利之所在,不过在当时这样的看法往往难以为普通民众所理解,于是他便写诗以言之。许棠等诗人受到皮日休的影响后开始一改以往文学创作对大运河的全盘否定与全面批判,转而发展成为一种“重评大运河”的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之后,随着这些诗词不断地流传到民间,随着运河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越来越明显,人们也都开始普遍地肯定隋炀帝的运河开凿之功——大运河诗词在此促进人们的意识形态完成了一次巨大转变,从而有助于当时和后世对大运河的积极保护、开发与利用。

综上所述,大运河诗词不仅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结构和形态上深刻表现着“大运河文化”,也通过特定思想的表达,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潮流,影响人们对大运河的看法和态度,进而对“大运河文化”乃至对整个作为物质存在的大运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若非如此,中国大运河有可能不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模样,或者甚至已经消失。因此,大运河诗词,作为大运河这一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不仅是“镜”而以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文化为“源”,同时也发出了思想或精神之“力”,在推“动”着作为物质文化的大运河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

### 三、结 语

本文分析、论述了作为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大运河诗词与其物质文化“母体”——大运河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全文的论述、可以说,正是由于大运河诗词等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存在和作用,中国大运河才不仅仅是一条运输、交通的河流,更是一条文学、艺术与文化的河流,它是一条同时拥有经济价值、政治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的中国文化“母亲河”,是不可多得的人类财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 [1] 苗菁. 唐宋诗词与大运河 [J]. 聊城大学学报, 2014 (5).
- [2] 彭定求, 沈三曾等编. 全唐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04.
- [3]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 (上册) [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6: 77.
- [4] 夏承焘等, 宋词鉴赏辞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93.
- [5] 皮日休. 皮子文藪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41.
- [6] 石介. 徂徕石先生文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1.
- [7] 梅尧臣.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中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796.

(上接第 101 页) 这就给了我们新的希冀:“衰男”形象在制造滑稽的同时, 应不忘立足现实, 合情合理, 在调侃中蕴涵人生的智慧, 于平庸处现友善, 努力弘扬正能量, 真正强有力地肩负起喜剧寓教于乐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捷]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 [M]. 孟湄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46、138.
- [2] 饶曙光. 中国喜剧电影史 [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194.
- [3] 杨新宇. 陈强陈佩斯父子喜剧片散论 [J]. 电影创作, 2000 (04).
- [4] 赵涛. 狂欢与落寞: 九十年代中国 (大陆) 喜剧电影的文化审视 [J]. 电影评介, 2008 (20).
- [5] 冯国翼. 人到中年的文化回归——第六代导演创作转型的缘由 [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3 (01).
- [6] 黄宝富. 后现代语境中喜剧形式的现代性诉求——电影《斗牛》分析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0 (02).
- [7] 吕武平等. 心理门诊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297.
- [8] 钱铭怡.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202.
- [9]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诗学 [M]. 陈中梅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38.
- [10] 王治河. 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4—35.
- [11] [法] 居伊·德波. 奇观社会 [A]. 吴琼. 视觉文化的奇观 [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360.
- [12] [美] 马克·波斯特. 信息方式 [M]. 范静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3.
- [13] [英] 史蒂文·康纳. 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57—359.